

余杭医学史略

胡 樾

余杭位于浙江北部，杭嘉湖平原南端，拱卫杭州市，濒临钱塘江，与宁绍平原隔江相望。天目万山之水直泻入苕（霅）溪，经杭嘉湖平原汇入太湖；京杭古运河贯穿县境，北向直达京华；沪杭铁路从县境东部横串而过。以今日的境域而言，是个“省会（杭州）近郊县”。自古以来与杭州有难以分割的历史意义和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；是吴越故地中的一隅。

一、经略江东与地域文化的结合

翻开中国的历史，自《春秋》编年开始，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好像总是由北向南，由西趋东，似乎东渐是最佳的路线。一代雄主秦始皇统一六合，曾东巡至浙江、登秦望山。他不仅据有黄河，而且占有长江。今杭州湾的秦山当年曾留下秦王的足迹。

汉朝历时 400 多年，其中半数时间，都长安，史称西汉；后二个世纪，迁都雒阳，史称东汉。仍停留于黄河流域；但它的转移和发展方向，仍然是向东。

吴、东晋，以及与北朝对峙的南朝——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建都南京，先后 368 年，从此已越过黄河，而达长江流域，这

是首次经略江东。

吴越钱镠，初以唐节度使坐镇浙江。唐亡，五代十国时为吴越王，治理浙江达 71 年。虽是地方之治，但也避免了卷入中原之战乱，使之休养生息，发展生产。

南宋赵构立临安（杭州）为行在所，至赵昺灭，前后 150 余年。虽属偏安，江左有了相应的发展。

明初，崛起于江淮的朱元璋建都南京，可以说从长江流域起家；到朱棣才由南向北，迁都北京。明初的政治中心也在江左。公元 1425 年至 1433 年，郑和七下西洋（南洋），经苏、浙、闽而至爪哇、婆罗洲、苏门答腊，直达好望角等三十余国和地区，开辟了海上“丝绸之路”。此后，南方开始出现了一丝曙光，南风北上。鸦片战争之后，太平天国从南向北一度饮马长江。为时几何，珠江流域又成为辛亥革命的孕育地。长江流域一带几乎成了南北风暴、新旧势力交战，以及帝国主义入侵的错综复杂的争夺点。但不论怎样，吴越故土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地带。

六朝、南宋、明初三次经略江东；加之钱镠的地方自治，有 680 余年。以秦统一华夏二千多年历史推算，几乎占 1/4 的年代。周平王四十九年（前 722 年），《春秋》编年开始，也占 1/5 的年代。这段时期是融合、筛选、创新的年代。江东的发展也反馈刺激中原的发展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也推动了医学事业的发展。这可能是历史的机遇，吴越人不保守，有开拓精神。

二、吴越一隅

吴越的地域范围，一般说北至长江下游的宁、沪、杭，太湖流域三角地带；“良渚文化”覆盖整个太湖流域。南达钱塘江对岸的宁绍平原，与“河姆渡文化”相映成辉。方圆辽阔。

吴越一隅，这里仅指长江之南，钱江以北，太湖流域的钱塘一带。她包括杭州余杭及钱塘、仁和（民国时钱塘、仁和两县合并为杭县）。

秦王政二十五年（公元前 222 年）建郡县，余杭、钱唐（唐时改为钱塘）、始置县，隶属会稽郡。后又时郡时县。隋唐废钱塘郡、设杭州。钱镠划钱江；北宋更名为仁和。南宋以临安（杭州）为都城。钱塘、仁和同城设治。郡、州治，轮番设于余杭、钱塘，史有记载。总之，在古代史、近代史上，余杭、钱塘、仁和之间有难以分割的历史意义和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，甚至血缘关系；直到 1927 年，从杭县划出六个区为杭州市，至今还不到 70 年的时间。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赞誉钱塘、余杭的诗词，唐杭州刺史白居易诗：“余杭（泛指杭州）形胜四方无，州傍青山县枕湖，……”柳永有：“东南形胜，江吴都会、钱塘自古繁华”的赞语。其实无论说余杭，话钱塘，都是泛杭州，吴越一隅。近年出版的《余杭县志》把余杭的特点归纳为：“省会（杭州）近郊县”。她曾经托起六大古都之一的南宋都城，吴越王国，以及郡、市、县三位一体的泛杭州。

三、地理与疾病

纵观二千多年来的医学文化史，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，以及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。前者为主观因素，起主导作用；后者为客观因素，但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侧面。自然环境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温床，是医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个方面，当然它不是疾病发生的全部因素。

县境地理座标为北纬 30°09'—30°34'，东经 119°40'—120°23'，属北亚热带南缘的季风气候。医家多精辨善治时病、杂病。历代不乏识精、辨证、善治的名家。钱塘仲氏世医

则”识用精微，虽用恒法而奇效“过于人”。天目山丘陵地带，为苕、霅之源，流向太湖，为太湖流域水系。气温偏低，“疟”多于平原；苕溪两侧为湖沼地段，京杭古运河、上塘河四周港汊繁密，为水网地带，民苦于“盅”、“大脚风”、“老烂腿”，几乎到处可见。吴越争战后，江东战乱虽无中原逐鹿那样频繁，但也不免于兵戈之厄。时疫随之而起；也合乎“大兵之后，必有大荒，大荒之后，必有大疫”之说。水旱等自然灾害也带来了疾病的发生和传播。自南北朝以来至民国，仅不完整的记载，发生水灾 166 次，旱灾 84 次，约 2：1。例举：明崇祯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年（1639—1641），“钱塘大旱、飞蝗蔽天，食草根几尽，人饥且疫”。自海运畅通后，某些疫病经海运传入，与历次世界性流行有关。与疾病作斗争，需要有医药来制约。余杭（泛杭州）之所以人物荟萃、孕育过许多有名望的医学家，与历史、地理、气候、水文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，今且纪之。

四、余杭医学史略

吴越一隅，依托史前“良渚文化”时期积蓄的潜力，步入文明的门槛。科学文化，包括医药文化，有悠久的历史；与中原文化相互撞击、交流中，显示了她特有的地域风貌。

相传伏羲制九针，黄帝岐伯论经脉、神农尝百草，形成“三世医学”。对吴越一隅，钱唐、余杭一带不无影响。医学文化也因此而发展。名医辈出、药局林立。吴·方士葛玄、晋·葛洪、炼丹、兼综医术、植药于葛岭。宋·郭祥正诗云：“两葛既成仙，犹有炼丹处，有时化鹤来，徘徊不知去”。今葛岭、余杭山、临平山（丘山），均有其遗迹。大涤山隐士郭文举，携驯虎卖药于虎嘤亭。良渚及七贤桥一带的东晋古窑址出土文物中有青瓷三足圆砚及唾盂，后者为卫生用具。晋

宋年间，徐熙、好黄老术，隐居秦望山，有道士授以瓠瓠（葫芦）及《翩鹊镜经》。告以“君子孙宜以道术（医术）济世”而学之。子秋夫；孙道度、叔响，皆精其业。道度有足疾，宋文帝令小舆入殿，为诸皇子疗疾，无不验。文帝云：“天下五绝，而皆于钱唐。”其中一绝即徐道度疗疾。徐氏后裔皆精医，世称徐氏七代世医。梁·陶弘景《名医别录》，称临平山干洞内的细砺石为“越砥”。《本草》载：“砥石出临平”（清·沈谦《临平记》）。

晚唐，钱塘（避讳，改“唐”为“塘”）。陈士良以善医闻名，诏修《圣惠方》。

北宋（960—1126），杭州为两浙路治，领钱塘、钱江（仁和）、余杭等九县。当时有类似的医院，以佛家世间“三佛（福）田”之说，而取名“福田院”。钱塘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了一部分医药研究心得，并著《良方》。宋人将它与苏轼的《苏学士方》合辑为《苏沈良方》。此书可谓集医学良方之总汇，对后世影响甚大。苏轼二度治杭，政绩犹存。元祐四年（1089）四月，在众安桥太平坊建安乐坊。聘请名医治病，后改为安济坊；延至元世祖时也在此设惠民药局。明代亦然，故称惠民巷，以疗民疾。此是后话。

南宋偏安，长江流域一带再次出现繁华景象；当然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从汴京扈跸南下医家与地域名医汇集。武林医薮，群贤毕集。医学文化得到了渗透、并蓄、筛选、吸收，发扬光大。陈素庵，其先人于建炎中（1127—1130）扈跸而南，遂为钱塘人。仕至翰林金紫良医。精妇科，曾疗高宗妃危疾，得赐宫扇，人称“陈木扇”。李信，从高宗南渡，遂为杭州人；高宗得疾，诏入宫。因年老行走不便，特许乘小车入禁中，人称“李车儿”。“嵇接骨”嵇仁伯，其父

由汴扈跸南渡，为仁和人。熟谙金疮骨损正骨之术，曾治疗孝宗腰伤，其居处称“嵇接骨桥”。靳鸿绪，东京名医靳豪之后，起蛟子，钱塘人。辑《内经纂要》。鸿绪子咸、吉，为诸生，得家传，亦善医。严防禦、钱塘人，曾为孝宗治痢，赐杵药金杵臼。其居处后人呼为“金杵严防禦家”，亦称“严官巷”。爱国诗人兼通医学的陆游，曾客居临安。他在《记悔》中写道：“我悔不学医，早读黄帝书”；在《山村经行因施药》诗中：“驴肩每带药囊行”句，著有《陆氏续集验方》。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在临安设行在太医局熟药所及和剂局，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。罗知悌、钱塘人，宝祐年间（1253—1259）任宫中医侍。能文章、善书法，宋亡归隐。晚年得弟子朱丹溪，尽传所学，著《心印绀珠》。后来浙东的丹溪学派（养阴派）有其渊源；朱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。当地中药材资源丰富，在唐宋时就享有盛誉。全国有名的“浙八味”，县境内就盛产麦冬、元参、白术、杭菊等多味。如以当时的历史境辖，何止此数；出现了一个空前的钱塘医学文化发展时期。至元代尚有钱塘名医吴恕，工岐黄术，官至太医院御医，著《伤寒论赋》、《伤寒活人指掌图》；仁和沈问好，世业儿科，尤善痘疹，时人呼为“沈铁针”，著《痘疹启微》、《本草类证》。

明初，长江流域又成为京畿之地。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，定杭州为浙江省会，为畿辅之地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医学卫生事业出现了第三次繁荣和发展。余杭陶华，史称治病有奇效，治伤寒一服即愈，名动一时，人称“陶一帖”。著《陶氏伤寒全书》，亦称《伤寒六书》。在伤寒分证和治法，较之前人有所发展。钱塘孙钝，著《试效集成》，医名倾海内；与皇甫泰齐名，人称“孙皇”。余杭严元、严大纪父子精岐黄，

嘉靖年间先后为御医。钱塘姚应凤，明太医院院判，以疡医知名，割皮刮骨，一见洞然知表里。钱塘戴曼公，明诸生。明亡后寓居濮院。于清顺治十年（1653）赴日本，自号“天外一闲人”；与明季遗民朱舜水交往甚深，互有诗书相赠。据《日本医学史》载，曼公作医籍八种。陈振先，一作明德，日名颖川人德，明杭州人。赴日本长崎安居，对日本汉方药发展有所建树。余杭陈元赞，好学、精医，长诗文，傍及书法、绘画、建筑。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东渡日本，被日人尊之为“介绍中国文化之功劳者”。日本一时盛行丹溪学说与陈有关，终老异域。张遂辰，字卿子（1589—1668），为崇祯时诸生。明亡后迁居杭州东菖蒲巷，人称“张卿子巷”。精医术、工诗文，擅治伤寒。著《张卿子伤寒论》，自成一家言。医学名家云集，也盛产药材。《嘉靖仁和县志》，乔司、九堡等地所产药材，有香白芷、麦门冬等，“堪以充贡十三品”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，甲申鼎革，明亡，易鼎于清。

清代立，杭州府为杭嘉湖道治所。自此，余杭、钱塘、仁和三县并存至清末。长江流域一带医药事业继往开来，更有所发展。钱塘张志聪，祖籍河南，其十一世游宦钱塘，卜居湖上，遂为钱塘人。弃儒习医，受业于张卿子门下；复受名医卢之颐的影响。广览前代医籍，药到病除，声名隆盛。在胥山（吴山）建侣山堂，聚同道及生徒数十人、论医讲学，开医学教育之先例。钱塘高世栻从其学。张、高相处十年，尽传所学。张逝世后，高继其志。聚弟子于侣山堂讲学。张、高合撰《本草崇源》、《伤寒论集注》。此外，各有大量著作问世。“武林为医薮，大作推钱塘”的赞誉从此而起。仁和陆圻，康熙时拔贡。与弟埈、培，以文章经世，颇负盛名，誉为“三陆”，为西泠十子之冠。后淡于功名，提囊鬻药于三吴间。与

临平沈谦文字交，友谊弥笃。圻因庄庭钊《明史》案，受文字狱株连，几濒于死。著《本草丹台录》等医籍及诗文。魏之琇，字玉璜，号柳州，康熙年间钱塘人。早岁于瓶窑质肆凡二十年，家本业医，尽览家藏之籍。精医、穷理，遂辞归悬壶，编《续名医类案》、《柳州医案》。赵学敏、雍正钱塘人。父曾总鹺下砂盐场。与弟学楷、涉经史、习《灵素》，于居处辟地一畦作药圃。著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、《医林集腋》等。

鸦片战争（1840）后，列强入侵，辟地订约，海禁大开，启动了近代史的一页。境内有识有志之士，弃科举，学习泰西医学之风日盛；至“五四”（1919）尤炽。西医偏重理科，而中医与文相通。于是出现了祖国医学与泰西医学各领风骚的新局面。她的过程，似乎是引入——并举——争论，到民国时期祖国医学几乎濒临灭绝的危机，先后相持一个多世纪，在祖国医学方面，钱塘儒医仲学谔，曾为慈禧太后疗疾，并主浙江医坛；朴学大师俞曲园先生恨俗医，愤而作《废医论》，委身天命。后自己患病，经仲治愈，才折服，叹曰：“道未绝也”。民主革命家思想家、医学家余杭章炳麟、钻研医学、巨著百余篇，被誉为“国医革新之导师”，在振兴祖国医学，推崇仲景学说，汇通中西医等诸方面，有杰出的贡献。杭县沈祖緜，从训诂校勘入手，精研《周易》、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，为近代医学理论家。仲、章、沈三氏，可称得上近代医学理论界三巨擘。号称“浙江四大名医”之一的仁和钱家兜内科姚梦兰，其弟子姚耕山、莫尚古、马幼眉，人称“三鼎甲”。当代名医禹航叶熙春、秀州潘韵泉为莫尚古弟子；武康史沛棠为姚耕山门人。姚氏一脉相传至今 150 余年。与姚氏内科有源渊之系的野茅山俞氏一支也有 150 余年历史。今江浙各地不乏姚氏传人，后者以服务乡梓为多。钱塘运河乡吴

家厍内科至今也有 150 余年历史。余杭仓前葛载初，治病有奇效，并带有传奇色彩，名重两浙。曾获近贤秦伯未誉为：“名震南北、学问深渊、案语多俚体，千言立就、一时无两。”的桐乡大麻金子久，传人众多，当代名医杭县乔司张硕甫是其中之一；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病，闻名于杭垣。中外科也颇多名医，溯其源，多师承邻县“二湾一汇”。德清曲溪湾潘氏门人，杭县严庄费元春，其弟子俞步卿为当代杭州名医；东南湾夏氏传人，杭县肇和李以锄，其弟子为今浙江中医学院魏康伯教授；洛舍（后迁菱湖袁家汇）吴氏传人，广泛分布在市郊、近县。众多的疡科弟子，都经当地文化的渗透，既有师承，也有自身琢磨心悟的中外科特色。专科者有钱塘七贤桥田氏妇科；仁和塘南龙光桥黄氏眼科等等。民国年间，余杭镇苕溪旁的小小木香弄，名医云集，各科俱全，有“十殿阎王，一孟婆”之称；谓能着手回春，决生死之意。西医方面，开始都集中在城市，然后影响到郊区。清·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杭城办“广济医院”，继附设“广济医药专门学校”。1911 年，韩清泉、厉家福、汤尔和（此人后期在华北沦为汉奸）等人，在羊市街办“浙江病院”。汤主内科，厉为儿科，韩自任外科。1912 年 6 月，韩清泉以浙江病院逐渐稳固，社会信誉益高，乃集同仁筹划“浙江医学专门学校”。医科第一期招生 60 名。翌年，增设药科，更名为“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”。1915 年，教育部召开教育成绩展览会。经评定浙医成绩优异，列为特等，获“绩学宏仁”匾额。杭县良渚张辅忠为该校药科首届生，留德获药化学博士学位，为祖国第一位制造甘油的药化学家。自此，余杭、杭县学子负笈杭垣求学者日益增多。余杭蔡觉为该校药科 4 期生；徐承荫、胡宗逵为医科 15 期生；杭县仲颖（仲

昴庭之孙)，符士丰为该校医科7期生。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一月六日，法国天主教仁爱会修女HACCARD氏在杭州办“仁爱医院”。民国十九年，宓彰伦、陈德甫在塘栖镇开设彰德医院；同年，徐若仙从德清迁来塘栖开办产科诊所，为杭县第一位新法接生者。此后，仲颖曾在瓶窑镇设苕溪医药诊所；符士丰夫妇俩设诊所于临平镇；胡宗逵曾出任余杭县卫生院院长，蔡觉也在该院任药师。当地及客籍医药学者来县境服务者与日俱增。自1927年县、市分置后，人物籍属才得以分清。随着时代潮流，他们的活动范围已不再囿于桑梓，超出县域省垣涌向城区，遍布海内外。昔是故地人，今是他乡客；走向大江南北，甚至海内外，也难以一一入笔了。

建国后，医学卫生事业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发展。党中央提出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”和“团结中西医”；90年代又提出“中西医协调发展”；“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”的决策。1991年10月22日《北京宣言》又提出“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学”，成为新时代的医学，服务于全人类。吴越一隅的医学文化，在余杭、钱塘这块古老而常青的土地上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；谱下了一曲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味！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。瑰丽多姿的当代医学卫生史诗，拙笔无力胜任，也不是本文的使命，有待大笔家来续书吧！

近代医林人物●

医学界三巨擘

——记章太炎、仲昴庭、沈颀民

医学古列为方技门，历代人材辈出。先秦不论；汉晋以还；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奉为圭臬。至金元，有刘（完素）、张（从政）、李（杲）、朱（震亨），寒凉、攻下、补脾、滋阴各领风骚。明清以来，又遍重温病调理，辨证论治，各具特色，但不逾长沙之矩。在晚清及民国期间，钱塘仲学轺（昴庭）、余杭章炳麟（太炎）、杭县沈祖緜（颀民），从训诂校勘学入手，从事医学研究，均有其独特的见解。仲昴庭，好明道伊川之学，尤精医；章太炎被誉为国医革新之导师；沈颀民精研《周易》、《灵》、《素》，均有深厚的医学造诣。仲更有丰富的临证实践经验。在余杭、钱塘这片故土，滋润了三株巍峨而清秀的“灵芝”。他们的真知灼见，影响深远。仲氏世医为章太炎先生所叹服；章与沈颀民促膝讨论国事，倾心研究学问。章自谦：遍治诸经，独不敢言《易》、盖沈氏治《易》有独到之处，由《易》而治《灵》、《素》。近代内科名医姚梦兰一脉传人叶熙春，也受到太炎先生“不通国文、无谓国医”的启发，苦心钻研经籍，发奋自励，而成为一代名医。回顾一百多年来，全县各医学世系崭露头角的几位名医，他们的国文功底，文化基础都比较扎实，才可能出神入化领悟到医学

的真髓，发挥到医术上去。余杭近代医学文化的带头人可以说是章太炎先生当之无愧。章、仲、沈三氏鼎足而立，推动了乡土医学文化的前进。也为国内外医学界探索到一片新的绿洲，有待后人进一步去开拓。今且为文介绍之。

(编者综述)

国医革新导师章太炎

胡 樾

章太炎是一位很有特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，是近代中国思想史、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^{〔1〕}。他的革命业绩、学术贡献，史家早有评说。这里仅从其政治生涯及渊博的治学中掇取研究医学的一个侧面，作一鸟瞰，对研究近代医学文化史或有所裨益。

政治生涯与治学精神

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，名炳麟，字枚叔，余杭仓前人，为敬崇民族文化大师顾亭林（号炎武）和黄宗羲（号太冲）的学问和气节，取号太炎。他一生处于鸦片战争、列强入侵、“五四”运动、辛亥革命、封建皇朝彻底崩溃，新时代崛起的中国近代史上风云幻变的动荡时刻。他曾经作过维新改良派的信徒。戊戌变法，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，使他一改初衷，毅然与清庭挑战。鲁迅先生曾对他评价：“考其（太炎）生平，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派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，并世无第二人；……”。“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，并世亦无第二人”^{〔2〕}。袁世凯死后，他与孙中山一起组织“护法运动”，经年奔波，却无法阻止军阀混战。他失望、彷徨、消极，使他逐渐脱离民众而落伍。但他仍孜孜

不倦致力于学术上的新探索。从他诸多著作，可以证实他是一个不甘寂寞而努力进取的学者。鲁迅曾说过：“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，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……”^{〔3〕}。抗日运动爆发，他已年迈病笃，上书蒋介石积极要求抗日，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和爱国者的晚节。1936年逝世于苏州。解放后遵其与民族先贤张苍水地下比邻的遗愿，迁葬西子湖头。可以“相逢应共说兴亡”了^{〔4〕}。名作家周瘦鹃撰联挽之：“吴其沼乎！昔诵遗言惭后死；国已兴矣！今将喜讯告先生”^{〔5〕}。

太炎的学术涉及面很广，无论哲学，经学、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佛学、医学、文字学等都专心钻研。“他实在是一个心灵巨大的思想广博的近代奇人”^{〔6〕}。

医学研究和著作

从医学这个侧面，可窥侧他治学严谨，尤其晚年，潜心研究哲学、佛学、经学、医学，他完全可以从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的高度，广博学术思想的不同角度，自由驰骋，来剖析这块古老而常青的医学园地。“包括医经、经方的研究，医学典籍的考证，医史人物的述评，古代医用度量衡的详考、单方、草药、铃医”^{〔7〕}等等，都有独特的见解。从他的家族史，文字交，不难看到他与医学有深厚的渊源。

太炎尝言：“吾家三世皆知医”^{〔8〕}。“祖晓湖先生，中岁好医术。有周秦及唐宋明清诸方书悉诵上口。以家富不受人餽胥，时时为贫者治疗，处方不过五六味，诸难病旬日起”^{〔9〕}。父轮（楞）香、“生平长于医，为人治病、辄效。暇则以诗自娱”^{〔10〕}。兄椿伯，从钱塘仲昴庭习医，“家居又宦游所至，有筭人子求治疾者，必应之，所全活甚众。然未尝以技自暴，惧为显要役也”^{〔11〕}。

章均（安溥）[☆]—章鑑（晓湖）—章濬（轮香）—
章炳森（椿伯）
章炳箴[☆]
章炳麟

(注：“☆”未查及知医)

至太炎也精医，著作甚丰，对仲景医学研究尤深。曾著《张仲景事状考》、《葑汉闲话》，为《伤寒论单论本》、《何本金匱玉函经》、《伤寒论辑义》、《伤寒论今释》、《中国医药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医药问题》、《重刻古医书目》等书籍校核、题辞、作序。还在当时出版的医学刊物撰写研究《伤寒论》，评价各家流派，探讨脏腑经络实质和考证，偶也为人治病。他的医学著作、评论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，被任为上海国医学院院长、苏州国医学校和苏州国医研究院名誉校长和院长，并亲自为国医学校题写了“诚敬勤朴”校训。太炎先生介入医学阵线的时刻，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地位，医学本身也由于近代西方医学的介入，祖国医学面临冲击和挑战的年代。两军壁垒森严，各执己见，有互不相让之势。而太炎先生以博大的胸怀，公正无私的精神，捍卫传统医学，但他又不摒弃西医，主张中西医兼容，互补短长。他从三个方面着手，投入这一战斗。一、发表大量医学著作，以抒己见；二、从事《伤寒论》的研究，来扩大祖国医学的影响；三、广交中西医学界有识之士，以表达他中西医兼容国医革新的主张，诚不愧为“国医革新之导师”。

一、太炎的医学著作：根据现有手头资料，戊戌变法事败后避难台湾，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农历1月27日在《台湾日日新报》发表《论医师不宜休息》^{〔12〕}；1910年《学林》披露了“医术平议”；1923年《华国月刊》刊载了“似重刻古医书目序”。从是年起大量医学著作陆续公诸于世，直到

谢世。在这 14 年中可以说是太炎致力于医学研究最旺盛阶段。据不完整统计，有百余篇之多，虽专业医家也有自叹不如之感。编纂成帙者计有：医学巨著《粹病新论》5 卷，前 4 卷于 1924 年成书，几易其稿，编成 5 卷，38 篇，不下 10 余万言。

医学演讲词 1 篇；

医学论文 28 篇；

论医书牍 12 篇；

医学考证 3 篇；

医学文苑 16 篇^[13]；

医学补遗 18 篇。（篇目见附表）。

太炎先生医学论著众多，且博大精深，猎及面广；其中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颇透彻。又认为“中西医学不谋而同”，主张传统医学与泰西医学兼容，开启了中西医结合的先导。他还认为疾病的发生、发展有内外因素的凑合，绝非单一条件可以致病。这些观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诚属难能可贵。

医林情深 片语寄心声

太炎与医药界同道交往甚深，诚恳而感情深笃，在文笔中时有流露。如盛赞钱塘儒医仲学谔的《仲氏世医记》^[13]，曾撰《余觉先先生墓志铭》。文曰：“余以暇日窥《本草》、《经方》、闻范玄平，殷仲堪。陆敬舆、刘梦得之风而慕之。友人镇海余岩云岫习远西医术，亦编窥域中方，时与讨论，往往有所获”。“云岫以其先人觉先先生状请铭，……”。铭曰：“倜傥之行，而束于市间。百金之产，而施若有余。赵邠卿之节与？王彦方之德与？”^[14]。悼念名中医恽铁樵、陈善余；名西医江逢治的挽联及项松茂谏，感情真挚，词句委婉动人，今

录如下：

挽恽铁樵：“千金方不是奇书，更赴沧溟求启秘；五石散竟成末疾，尚怜甲乙未编经”。

挽陈善余：“论文在三十载以前，盛德若虚，未就疠乡窥藏史；学医自中工而下，圣儒长往始知元里有方书”。

挽江逢治：“医师著录几千人，海上求方，唯夫子初临独逸；汤剂远西无四逆，少阴不治，愿诸公还读伤寒”。

项松茂谏：“君之卖药，上希韩康，厥志超奇，士也非商。……为义舍生，是为国殇”。

太炎对预防医学也极关注，曾作防疫诗二首。

“高柳日光赤，飞尘乱度墙，济生无桔井，隐背尚藜床。灶上若新菜，阶前抒酢浆。何当赴龙窟，一写百金方。”

少壮日以去，员舆存旧人。暴书常苦热，裹药暂宜春，汤暖浮筒桂，盆坚捣细辛。颓龄如可度，焉用坐庚申”。

太炎的医学识见和治学方法为现代医学所接受，在医学界有一定的影响。如名中医祝味菊，章次公，陆渊雷、徐衡之，叶熙春等在学术上均有不同程度受其影响。其部分遗作曾由《苏州国医杂志》于1936年夏，编辑“章校长太炎医学遗著特辑”，出版问世。章次公曾赞誉曰：“语必徵实，说必尽理，所疏通证明者，而皆补前人所未举，……”^{〔15〕}。太炎治学涉及诸多领域，医学仅其治学中的一个分支。今稍加点述，以不敢忘其对医学的贡献。